
新发现的有关日本虐待 被强掳华工情况的资料

刘宝辰

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为解决劳力严重匮乏问题,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,将中国战俘及平民强行押运到日本充当“劳工。”从1943年开始,日本先后从中国强掳去约4万人,分配到35家企业的135个事业所强制劳动。日本投降后,外务省为应付联合国对战争犯罪的调查,曾为此事整理了一份文件即《外务省报告书》。但后来日本政府却否认有过《外务省报告书》这样的文件。

1993年春天,日本广播协会(NHK)发现了《外务省报告书》的原件。他们根据文件中提供的线索,采访了日本、中国和美国的几位知情者,于5月17日和8月14日,先后两次以特别电视节目的形式,向日本全国播放。

据该节目,日本广播协会社会部记者藤田美和子女士,采访了东京华侨总会名誉会长陈焜旺先生,并亲眼见到了在东京华侨总会大楼收藏了近50年之久的三份文件资料。

其一是135个曾强制使用过中国“劳工”的矿山、搬运、建筑等事业所,于1945年底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的《华人劳务者参加劳动始末报告》(简称《事业所报告书》)。该文件详细报告了从何时开始,多少名中国人被送来强制劳动,他们的工种、姓名、年龄、籍贯,死亡者的死亡原因及时间,对这些中国人的生活待遇和管制措施等等,有的报告还记载了日本警务工员和管理人员的姓名。

其二是“东亚研究所”接受外务省的命令,为了核实各事业所

的报告,组织人员到各个事业所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后,写成的《实地调查记录》。

其三是外务省根据《事业所报告书》汇编成的一份正式文件,即《华人劳务者参加劳动情况调查报告书》(简称《外务省报告书》),共5册,646页,由外务省管理局1946年3月1日刊印。5册的标题分别为:要旨篇;第一分册,移入·配置及送还情况;第二分册,死亡·疾病·伤害及有关情况;第三分册,参加劳动情况·纠纷及劳动成果;别册,作业场所概要。

新发现的这三种文件资料,完好无损地封装在10个较大的纸箱(类似中国装香烟的纸箱)内,纸箱外标有分类编号和“永久保存”字样。陈老先生向藤田女士介绍说:为了防止火灾,这些资料以前曾分别放在几个地方保存,最近才集中在一起。陈老先生的谈话及对资料的现场启封,全都录音摄像了。

关于《外务省报告书》的由来,大致情况如下。美军进驻日本后,先后接管了一些有美国战俘和中国人参加劳动的事业场所。秋田县花冈町铜矿区中山寮幸存的中国“劳工”向美军揭露了日本鹿岛建设公司的种种罪行,于是盟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并组织人员对“花冈事业所”进行调查。日本外务省为应付调查,于1945年冬命令135个事业所,各自搞了一个关于使用中国“劳工”的报告提交给外务省。当时的外务省调查官,现还健在的平井庄壹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:当初外务省召集135个事业场、所的管理人员到东京,指定他们如何编造一份报告,他本人参加了对这些报告的汇总工作。他肯定了所发现的文件确系当年的原件。

从1946年1月开始,外务省又组织对各事业场、所进行实地调查,由“东亚研究所”16名研究人员分别承担。大友福夫先生(现年79岁,当时为东亚研究所负责劳动研究的主任研究员,现为专修大学名誉教授)亲自参加了三个事业所的实地调查。他对记者证实:进行实地调查的目的有两个:一是《事业所报告书》把死亡中国人的死亡原因,几乎全部写成是“肠炎”、“急性肠胃炎”、“痢疾”和

“肺炎”等疾病，实际上这些病是因营养不良造成的，不难治愈，故要查明中国人死亡的普遍原因和真正原因。二是有的《事业所报告书》中写到中国人在那里的居住“环境风光明媚”，根本未涉及对中国人虐待的情况。那么为什么有的事业所死亡率那么高？调查组查出了一些关于中国人生活、疾病和劳动的真实情况，如当时中国人吃、住、穿都很恶劣，日本对他们实行的是强制性管理。调查组根据调查结果如实整理成《现地调查记录》提交给外务省。然而，《外务省报告书》并没有采纳《现地调查记录》的内容。大友先生还出示了他保存至今的调查记录的原件和《外务省报告书》的目录，向记者作了介绍。他说：当他去大夕张矿业所调查时，那里的管理人员非常恐慌，采取多方应付的态度。对照大夕张矿业所报告中所写，中国人居住在“风光明媚的环境”里，大友先生发现，中国人实际上住在深山里头，每个人的床位只有“一席之地”（约1.2平方米），条件极其恶劣，其他许多方面也与《事业所报告书》不符。曾在大夕张矿业所当过医生，现在还健在的加藤喜一先生对记者证实：中国人住在深山里，离公路有七八公里远，这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。

北海道煤矿汽船公司空知矿业所赤间矿，在报告书中提到：中国“劳工”赵辉逃跑被抓回来，捆起扔到一边，因他总是喊叫。令人讨厌，管理人员用棉团堵上他的嘴而窒息了。而他的死亡诊断书上的死亡原因却写成“肋膜炎。”为证实这个问题，1993年7月15日日本广播协会采访组来到中国，我陪同他们采访了当年赵辉的难友贾双合（现住河北省正定县）。贾双合老人介绍说：下班后在回宿舍的过道里，看见赵辉被捆绑着吊在房顶上挨打，不停地喊叫，回到宿舍起初还能听到他的叫喊声，后来只听到“哼哼”声。听说是把他的嘴堵上了，到后半夜再没有听到赵辉的声音。以后再没有见过他，听说他死了，死尸怎么处理的不知道。

据NHK播放的材料揭露，当时日本国内对强掳去的“劳工”的管制工作全由内务省负责，内务省事务官本间曾提出一份有关管理“劳工”的“意见书”，并将它发到各地的警察署，各地的警察署

又根据它向各事业所规定了具体的管理措施。例如：北海道警察署对中国“劳工”的死亡原因如何填写有过明文指令：凡是自杀、被殴打致死等特殊死亡者，死因一律写为“疾病。”看来赵辉的死亡诊断书就是据此指令产生的。

原古河矿业公司足尾矿业所坑内管理员，现健在的细木原益三证实：当时对中国人管理的那些指示，警察署如实传达到了各事业所。由于这个文件，各事业所对中国人的管理是极为严厉的，中国人的生活条件也是非常恶劣的。原三井矿山砂川矿业所职员，现健在的龟田武治证实。他说：当时我们有运煤的生产任务，完不成任务仗就要打败，超额完成受表扬，要想超额完成任务就让中国劳工多出勤，无论如何也要保持到80%的出勤率。有人实在干不了，就让他回去休息，但中午饭就不许他吃了。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，我也是执行了这种政策的。

这些文件资料为何被封闭了47年？平井庄壹先生说，他参加编写整理了《外务省报告书》，整理完后便退职了。当时外务省指令称这份报告书是极密的，不许外传。因此他一直没敢对外讲，并认为这些材料早已不复存在了，没想到它还保留着。

《外务省报告书》于1946年3月1日刊印成册，只印了几份，外务省未把它提交给盟军最高司令部。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担心有更多的企业会受到追究、惩罚或治罪，因而尽量掩饰各企业罪行，不愿如实报告情况。原因之二在美国方面。NHK记者访问了当年盟军司令部调查官美国人威廉·辛甫森，他谈到：当时盟军最高司令部向美国政府打了报告，提出如再继续追究日本的战争犯罪，对日本的经济复苏不利，最好尽快结束这项工作。美国政府同意了以上意见。他在谈到当时未进一步追查“劳工”事件的原因时指出三点：1，中国发生了内战，中国政府不热心追查这个问题；2，花费很大精力追查此事对美国并没有什么益处；3，美国希望利用日本大企业界参与全球冷战，不愿伤害大企业家们的感情。因此，对日本企业使用中国“劳工”问题未再进行追查。

鉴于上述原因,日本外务省决定把《外务省报告书》等三种文件资料全部烧毁。据当年担任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的陈焜旺先生说,当时负责销毁这些资料的人,认为这些资料很有历史价值,不忍心把它们全部烧掉。东京华侨总会知道这一消息后,通过一些关系把这些材料中的一份偷偷运走保存起来了。大友福夫先生本人也保留着一部分。陈焜旺先生说:1992年10月日本天皇访华,标志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时期。最近几年来,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国,清算日本战争罪行,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,现在公开这些材料是时候了。它可以帮助当年的受害者和加害者,有根据地提出实事求是的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的要求,了结历史旧帐,这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巩固是有利的。这就是这些史料最终得以公布的原因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)